

经济一体化、公司所得税 竞争与FDI流动研究 ——以新老欧盟成员国^①的税收竞争为例

李 慧

摘 要: 本文在 Ottaviano(2005)的税收竞争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公司所得税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并利用实证研究论证了欧盟内新欧盟成员国与老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公司所得税竞争对 FDI 流动的影响。分析表明,欧洲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是导致税收竞争加剧的最主要原因。东道国降低名义公司所得税率对资本流动没有影响,只有相对于母国实际税率的降低才是影响资本流动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税收竞争; 资本流动; 欧盟

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2010)01-0064-09

一、理论回顾

税收竞争,是指一级政府采用财政税收手段吸引本地区以外的税源流入本地区,或以各种措施向外部转移税收成本的政府自利行为。从范围上,税收竞争可以分为国际税收竞争和一国内部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欧盟则将国际税收竞争定义为,旨在吸引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的竞争,表现在一国通过优惠的税收鼓励措施给外国投资者,使其投资于该国。可见,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快的进程中,试图影响国家间的要素流动特别是资本流动是当前各国税收竞争的一个主要动机。

针对这一问题,当前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是税收竞争的效果。有学者研究表明,由于国际外部性的存在会使税收竞争无效。比如,当一国提高税率时,资本所有人的税收套利行为,将使其他地区资本供给量增加。若一国政府忽视对其他国家资本供给的正效应的话,税率和公共物品的供给都处于无效率的低下状态(Tiebout,1956)。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尽管税收竞争在全球范围内是无效率的,但它能使一些国家获益。例如,当国家规模不同时,大国税率较高,小国的情况在有税收竞争时比没有税收竞争时更好,无效率的税收竞争产生的成本由于地区规模的不同而被不同地区不平等地分担(Bucovetsky,1991; Peralta and van Ypersele,2002b)。

收稿日期:2009-11-09

作者简介: 李慧(1979-),河南驻马店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国际资本流动。

Haufler 和 Wooton(1999)研究了当两个国家为垄断者竞争的情况。他们认为,即使大国征收了更高的税,它仍然赢得了这场竞争。这是因为贸易成本的存在使市场进入更方便的大国拥有了位置优势。换句话说,在不完全竞争企业和贸易成本存在的条件下,规模使国家在税收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Ludema(2000)和 Kind(2000)等表明,集聚经济产生了位置租金(locational rent),这种租金可以被政府通过税收征走而不引致要素在地区间的重新分配。Hines(1997;1999)回顾了美国相应的文献,研究认为:调高1个百分点的税率会引致0.5至0.6个百分点FDI内流的下降。

公司所得税率已经对跨国公司的决策行为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国家间法定税率的差异刺激了通过债务契约、价格转移等方法进行的利润转移行为,对子公司的股利汇回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更影响着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选择。本文在 Ottaviano (2005) 的税收竞争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并利用实证研究论证了欧盟内部新欧盟成员国与原欧盟15国之间的税收竞争对FDI流动的影响。

二、模 型

(一) 基本模型假定

假定经济中存在两个国家H和F。生产中存在两种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其中两国的要素禀赋分别用K和L来表示,且资本和劳动以相同的比例在国内分布。我们令 $\sigma \in (0,1)$ 为H国所拥有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同比例。国家的资本禀赋平均地为当地工人拥有,每个工人无弹性地供给一个单位的劳动。因此, σL 和 $(1-\sigma)L$ 分别表示居住在H国和F国的工人数。H国被假定大于F国,这就意味着 $\sigma > 1/2$ 。

根据 Ottaviano 等 (2002),工人的偏好被假定为相同,且用拟线性效用函数来描述。

$$V(y, p(i), i \in [0, N]) = \frac{a^2 N}{2b} - a \int_0^N p(i) di + \frac{b+cN}{2} \int_0^N [p(i)]^2 di - \frac{c}{2} \left| \int_0^N p(i) di \right|^2 + y + p_0 \bar{q}_0 \quad (1)$$

其中 $a, b > 0$, $c \leq 0$ 。(1)式中, $p(i)$ 是*i*种商品的价格, y 是工人的收入, $\bar{q}_0$ 是同质商品初始禀赋, p_0 为其价格。 $\int_0^N [p(i)]^2 di$ 度量了工人的多样性的偏好程度, c 直接度量了多样商品间的替代性($c=0$ 表示无替代)。最后,同质商品初始禀赋 $\bar{q}_0$ 被假设为对于消费来说足够大,从而始终严格为正。

差异商品和同质商品由两个不同的部门提供,即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前者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下运行。生产任何差异商品者需要有一固定数量的资本K,这里我们将其标准化为1。传统部门生产同质商品时规模报酬不变且完全竞争,且劳动L是唯一的投入要素,一单位产出需要一单位劳动L投入。传统商品被假定为自由贸易的,而现代部门商品则面临着贸易成本。特别是每单位国际商品运输时面临着 τ 单位以传统商品衡量的成本。另外,劳动与资本在国际流动中有所不同,特别是工人不可流动。因此,资本所有者的所在地是外生给定的,而资本禀赋是内生决定的。

(二) 自由市场均衡

均衡时,工人在其预算约束下最大化其效用;企业在其技术约束下最大化利润,所有

市场都出清。为了描述均衡的特征,我们选取自由贸易的同质商品作为计价物(numeraire)。

1. 需求 当价格给定时,对*i*运用罗尔恒等式得到了如下有关于*i*的个人需求函数:

$$q(i) = a - bp(i) + c \int_0^N [p(j) - p(i)]dj \quad (2)$$

上式表明对于某种差异品数量的需求是其自身价格的减函数,是其他差异产品价格的增函数。工人除了进行消费选择外,还面临着其资本投向的选择。相应的,效用最大化也要求他们将资本配置到租金更高的国家中。

2. 供给 在均衡中,给定我们选择的资本单位,*N*也同时等于总资本禀赋($N=K$)。从而,一企业在*H*国生产差异品*i*最大化其利润:

$$\Pi_H(i) = p_{HH}(i)q_{HH}(i) - \sigma L + [p_{HF}(i) - \tau]q_{HF}(i)(1 - \sigma)L - r_H \quad (3)$$

其中 q_{HH} 和 p_{HH} 分别表示国内销售数量和价格, q_{HF} 和 p_{HF} 分别表示出口销售量和包括运费在内的价格, r_H 表示资本在*H*国的租金率。根据(2)式,市场均衡结果由一个闭联参与人(continuum of players)的纳什均衡所决定(Ottaviano等,2002)。对于所有向*H*国出售的商品,均衡价格等于:

$$p_{HH} = \frac{1}{2} \frac{2a + \tau c n_F}{2b + cN} \quad (4)$$

$$p_{FH} = p_{HH} \frac{\tau}{2} \quad (5)$$

对于*F*国来说,表达式是对称的。且 $n_H + n_F = N$ 。不管企业在国家间的分布如何,当且仅当满足以下条件时,现代部门的贸易才会发生:

$$\tau < \tau_{trade} = \frac{2a}{2b + cN} \quad (6)$$

(4)式还说明了,给定企业所在位置(即给定 n_H 和 n_F),企业总量的提高降低了所有的价格,如果给定企业总数(即给定 N)的话,国际间企业位置的调整使企业流出的国家国内价格上升,而流入国价格下降。且当差异产品替代程度下降时(c 变小),均衡价格上升。最后,很容易证明

$$p_{HF} - p_{HH} = \tau \frac{b + c n_H}{2b + cN} < \tau \quad (7)$$

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利润为零。将价格代入(3)式,令利润为零并求解方程式得到 r_H ,结果表明*H*国资本租金率是 n_F 的二次方程:

$$r_H(n_F) = \frac{b + cN}{4(2b + cN)^2} \{ [2a + \tau c n_F]^2 \sigma L + [2a - 2\sigma b - \tau c n_F]^2 (1 - \sigma)L \} \quad (8)$$

同样, $r_F(n_H)$ 的表达式与上式相对称。

3. 选址 若令 $\gamma \in [0, 1]$ 为工人配置到*H*国的总资本比重,则资本市场出清要求 $n_H = \gamma K$, $n_F = (1 - \gamma)K$,代入资本租金率公式,可以得到 n_F 关于 γ 的表达式。

市场均衡条件下的选址即是满足两国资本租金相等 $r_H(\gamma) = r_F(\gamma)$ 时 γ 的取值:

$$r_H(\gamma) = \frac{b + cN}{4(2b + cN)^2} \{ [2a + \tau c(1 - \gamma)K]^2 \sigma L + [2a - 2\tau b - \tau c(1 - \gamma)K]^2 (1 - \sigma)L \}$$

$$r_F(\gamma) = \frac{b + cN}{4(2b + cN)^2} \{ [2a + \tau c \gamma K]^2 (1 - \sigma)L + [2a - 2\tau b - \tau c \gamma K]^2 \sigma L \}$$

通过求解套利条件 $r_H(\gamma) = r_F(\gamma)$, 得到

$$[2(2a - \tau b)(2\sigma - 1) + \tau c(1 - 2\gamma)K] \tau (2b + cK) = 0$$

当 $\tau = 0$ 时, 上式恒成立;

当 $\tau > 0$ 时, 需满足 $2(2a - \tau b)(2\sigma - 1) + \tau c(1 - 2\gamma)K = 0$

我们可以得到现代企业选址的内部均衡:

$$r^M = \frac{1}{2} + \frac{2(2a - \tau b)}{\tau cK} \left(\sigma - \frac{1}{2} \right) \quad (9)$$

容易证明 $\gamma^M > \sigma > 1/2$

其中 γ^M 大于 σ , 说明较大国家吸收的企业数量比重超过了两国的规模比, 即所谓的国内市场效应(Helpman, Krugman, 1985)。

令 $\gamma^M = 1$, 可解得 $\tau^M_{cluster} = 4a(2\sigma - 1)/[2b(2\sigma - 1) + cK]$, 即此时所有的企业充分积聚在大国。

(三) 引入税收竞争后的厂商均衡

令 t_i 和 t^L_i 分别为 i 国 ($i = H, F$) 单位资本和劳动的税率。厂商和消费者在既定财政政策的条件下进行决策。在 H 国, 均衡价格仍由 (4) 和 (5) 给出, 均衡资本回报由 (8) 式给出。对于 F 国表达式类似。 γ 代表工人投向 H 国的资本比例。

当均衡实现时, 任何资本所有者都无法通过改变资本投向国家来严格提高税后收益, 这要求对 $0 < \gamma < 1$, 满足 $r_H(\gamma) - t_H = r_F(\gamma) - t_F$, 并且对 $\gamma = 1$ [$\gamma = 0$], 满足 $\gamma_H(1) - t_H \geq r_F(1) - t_F$ [$r_F(0) - t_F \geq r_H(0) - t_H$]。

考虑存在内部解 ($\gamma < 1$) 时, 解套利条件得到的厂商的空间分布产生的均衡值是税收差异的函数:

$$r(t_H, t_F) = r^M - 2 \frac{t_H - t_F}{\tau^2} \frac{(2b + cK)}{cKL(b + cK)} \quad (10)$$

这表明一国较高的税率会阻碍厂商进入该国:

$$r_{t_H}(t_H, t_F) = -r(t_H, t_F) = -\frac{2(2b + cK)}{\tau^2 cKL(b + cK)} < 0 \quad (11)$$

其中, r 的下标表示对相应变量求偏导。

(四) 模型的主要结论

根据以上模型分析可以总结: 在无税收竞争时, 一国经济规模的大小对吸引资本流入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市场规模大的国家企业数量越多, 企业数量的提高引起所有商品价格下降。根据公式(9), 当贸易壁垒为 0 时, 现代企业选址是不均衡的; 当本国规模越大, 差异化产品的可替代性越低, 运输成本越低时, 现代企业就越有可能集中于本国: 如果 $0 < \tau < \tau^M_{cluster}$, 全部企业集中于大国; 如果 $\tau^M_{cluster} < \tau < \tau_{trade}$, 小国也会有部分现代化企业, 但大国与小国的企业数量之比会超过两国的规模比。

引入税收竞争后, 企业的选址条件发生变化。模型中 (10) 式指出了当贸易成本下降时, 高税率的阻碍进入效应会增强。因此, 贸易一体化使资本对税收差异更为敏感: 尤

其当贸易壁垒消失时, 税收差异对选址至关重要。

三、欧盟的税收竞争与 FDI 流动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新欧盟成员国家为达到入盟标准实施了全面的税制改革。到目前为止, 新欧盟成员国的税收体制已接近欧盟标准, 但是在某些关键领域仍展现出显著的区别, 比如税种组合与欧盟国家不一致。在公司所得税领域, 由于以往新欧盟成员国为吸引外资, 实行了各种各样的税收激励, 而这些激励措施与欧盟法律相违背。因此这些国家逐步改革其税收制度, 取消税收激励(tax incentives), 并不断调低税率。老欧盟成员国为应付来自新成员国的竞争, 也纷纷在 2003~2006 年降低税率。尤其是希腊、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 下调幅度最大, 在 5% 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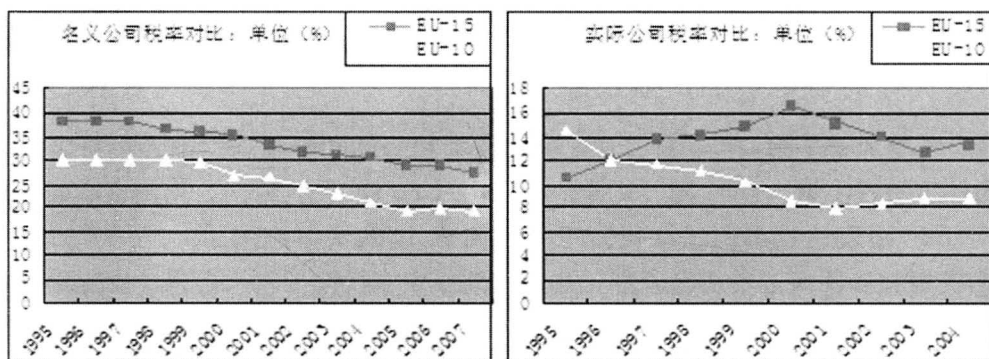


图 1 新老欧盟成员国公司所得税率比较

资料来源: EC, 2007b; KPMG, 2007.

1995~2007 年间, 老欧盟成员国的平均名义税率下降了 5.8 个百分点, 新欧盟成员国下降幅度更大为 13.9%。到 2007 年, 新欧盟成员国的平均税率比老欧盟成员国低了 9 个百分点。新欧盟成员国针对有限的税基实施了非常低的税率。最典型的例子是爱沙尼亚, 该国对投资的留存收益完全取消了税收, 并设定目标每年下调 1 个百分点, 到 2009 年将达到 20% 的水平。总体来看, 新欧盟成员国对投资实行了比欧盟标准低得多的税率, 如果把税收激励因素考虑在内的话, 新老欧盟成员国的税收差距就更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提到的税率均为名义税率, 但事实上名义税率与从实际征税的税收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关联关系, 这意味着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或者说实际的税收负担有很大差别。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德国的税率很高但是税收收入却非常有限,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爱尔兰, 该国税率较低但是税收实际收入却很高。因此名义税率仅仅是决定税收负担的因素之一。而关于税基的规定更加重要, 因为这为区分不同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机制。为了获得公司税的真实效应, 我们应该综合考虑名义税率和实际税基。根据 OECD (2002) 计算应税所得的方法, 收入应该对税收豁免、补贴, 减税、税收优惠 (tax credit) 等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免和补贴进行调整。最后的税基受折旧方法、损益的处理以及存货的估值等方法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实际税率的因素是税务局的征税效率。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有非常大的区别。目前计算实际税率的方法主要可以划分为前向 (forward-looking) 和后向 (backward-looking) 两种计算方法 (Malgorzata Jakubiak,

2007)。图1给出了新老欧盟成员国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对比。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1995年以来,尽管两组国家都大幅下调了名义税率,但是其实际税率的变化与名义税率却有显著差异。新欧盟成员国的实际税率下降幅度远远超出老欧盟成员国。

这些成员国的表现说明欧盟内部存在激烈的税收竞争,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税收竞争现象(race to the bottom)。毫无疑问,这种在公司所得税领域的税收竞争旨在降低在本地经营的企业的负担,从而希望达到吸引更多资本流入特别是FDI流入的目的。新欧盟成员国明显的低税率似乎帮助该地区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入。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新欧盟成员国社会制度和经济的发展,FDI的流入规模持续扩大,在2005年达到高峰,在个别国家甚至超过100亿欧元。即便是在2000~2002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不景气时流入该地区的FDI仍然处于上升态势。其中几乎有60%以上的FDI来自于原欧盟15国,特别是自2001年以来,欧盟15国更加积极地投资于新欧盟成员国。2004年以来,几乎所有新欧盟国家吸收的FDI都来自于原欧盟15国。

表1^② 新欧盟成员国吸收FDI主要来源国

(单位:百万欧元)

年份 国家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德国	5752	7541	10288	14661	18109	23763	27947	29241	29964	36712	na
法国	1397	1858	2415	3152	5248	9343	13161	10789	16341	24882	na
奥地利	2459	2786	3376	3998	4952	7238	9863	12373	13122	na	na
荷兰	1871	2749	3557	4667	7408	9114	10126	10957	13853	14636	18396
英国	440	794	2204	2573	1792	2285	6861	9209	9116	7346	8468
瑞典	na	232	573	1055	1752	3248	4922	5476	4511	7220	7085
丹麦	na	523	na	1628	1324	2469	3115	3201	3432	3669	3920
意大利	na	na	na	na	na	3550	3752	3462	3736	4267	4979
葡萄牙	na	2	17	55	179	271	653	419	392	23	na
芬兰	16	60	70	224	819	1370	1512	1660	2153	2355	3433
希腊	na	na	na	464	533	0	705	1266	1663	na	na
爱尔兰	na	na	na	na	na	na	na	7	na	15	na
EU15	71%	75%	36%	36%	72%	78%	57%	62%	63%	1	1
EU10	2%	2%	1%	1%	1%	1%	1%	1%	2%	0	0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EUROSTAT。

四、实证检验

1. 模型及变量选择 本文在传统的引力模型基础上就公司所得税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在以往的研究文献中,引力模型往往包括双边的经济总量、双方的距离(运输成本)、人口规模、制度等因素(张鸿等,2009)。本文重点考察税率变动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因此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变动,建立模型如下:

$$\log(fdi) = \alpha + \beta_1 nt + \beta_2 et + \beta_3 \log(GDP_p) + \beta_4 \log(dis) + \beta_5 lc + \varepsilon$$

其中,fdi代表t期第i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nt代表母国与东道国两国名义公司所

得税税率之比, et 代表母国与东道国两国实际公司所得税税率之比, GDP_p 代表母国 t 期 GDP 水平, dis 代表第 i 个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 (这里以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为衡量标准), lc 为母国与东道国在 t 期的劳动力成本之比。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这里主要考察新欧盟成员国捷克与老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税收竞争。以原欧盟 15 国中的 13 个国家 (爱尔兰和希腊流向新欧盟成员国的 FDI 数量微乎其微, 因此剔除这两个国家) 对捷克 (即捷克为东道国) 从 1996~2006 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这些数据主要来自欧盟统计局 (EUROSTAT)。

2. 计量结果 利用 stata10.0 计量软件对模型进行 OLS 估计, 得到计量结果如下:

fdi	Coef.	Std. Err.	t	P> t	[95% Conf. Interval]	
gdpp	1.288037	0.1925062	6.69	0.000	0.9053472	1.670726
dist	-3.399783	0.3658812	-9.29	0.000	-4.127131	-2.672435
nt	-0.5160181	0.5345976	-0.97	0.337	-1.578763	0.5467267
Et	1.137516	0.2950948	3.85	0.000	0.5508867	1.724145
Lc	-0.1096087	0.0583042	-1.88	0.064	-0.2255137	0.0062963
_cons	5.290967	1.468771	3.60	0.001	2.371147	8.210786

调整后的 R^2 为 0.7134, 说明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比较好。

3. 对回归结果的解释 一般来说, 人们普遍认为两国之间税率差异可以被视作二者税收竞争程度的衡量指标。本文根据欧盟 2007 年的税收报告中提供的数据, 同时考察了名义税率差异和实际税率差异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来看, 有三个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 分别是母国的经济规模、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距离、以及母国与东道国的实际税率之比。其中, 母国距离东道国的距离每增加 1%, 流入东道国的资本将减少 3.39% 左右, 说明中东欧地区吸收 FDI 存在着强大的“邻国效应”; 而母国 GDP 每增加 1%, 流入东道国的 FDI 将增加 1.288%, 说明母国的经济实力也是影响其对东道国资本输出的重要因素。母国与东道国相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在这里并未能显著影响资本流动。

回归结果中, 实际税率差异变量的系数为 3.39, 说明母国与东道国的实际税率差异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就将促使资本从母国向东道国流动增加 3.73%。可见实际税率对资本流动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名义税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对于投资者而言, 更关注实际的税收负担, 政府仅仅调整名义税率并未能对其资本流动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恰恰验证了本文模型的结论, 即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资本流动对实际税收负担会越来越敏感, 税收竞争能够有效地干预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

五、结 语

通过对税收竞争理论以及欧盟新老成员国内部税收竞争实践的研究, 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税收竞争 这些新欧盟国家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入盟的准备阶段。按照与欧盟签署的“联系国协定”, 2002 年之前就实现了工业品的自

由贸易,其余贸易壁垒也相继取消。因此贸易一体化是促成欧盟一体化进程的第一步。欧盟东扩后,新成员国与老成员国之间争夺流动资本的竞争加剧了,加上欧元的采用,使得欧洲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消除了资本流动的汇率风险。资本市场更加透明,利率趋同。如果说,在这之前老欧盟成员国只是担心由于税收竞争而产生的资本流动竞争,而欧元的使用使得这些国家开始采取切实有力的行动加入资本竞争的行列,使得新老成员国之间税收竞争日趋激烈。因此,欧洲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是导致税收竞争加剧的最主要原因。

2. 相比较名义税率,母国与东道国的实际税率对比才是影响资本流动的关键因素 由于实际税率需要把诸多税收减免和税收优惠考虑在内,而各国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为吸引资本流入实施了多种税收激励措施,这导致各成员国的实际税率与名义税率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加入欧盟前后,新成员国需要改革本国的税收制度,减少各种税收优惠的同时,也降低了名义税率。因此,尽管从名义税率上来看新老欧盟成员国都出现下降趋势,但是欧盟15国的实际税率却比新欧盟成员国高得多。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母国和东道国经济规模、距离、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后,我们发现,名义利率差异并未对资本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实际税收差异却能促使资本从税率高的国家流向税率低的国家。

3. 面对新欧盟成员国的持续降低的税率,老欧盟成员国该如何回应 的确,一个国家如果实施低税率,将会吸引资本或利润从其他国家流向该国。如果一个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税收政策,则会产生所谓的“以邻为壑”的结果。但是如果该国的基础设施薄弱、投资环境不尽完善,则会抵消这种因税收成本或要素成本所带来的优势。

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新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和制度正在朝着西欧发达经济体收敛。随着新欧盟成员国国内收入水平的提高、制度改革的推进、国内基础设施以及投资环境的改善,欧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将越来越高。在朝向完全经济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作用将被放大,为避免成员国过度竞争造成的财政收入下降以及可能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欧盟将不得不采取更多有效的税收协调政策以应对过度竞争可能带来的危害。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注 释:

- ① 这里新欧盟成员国指捷克、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等10国;老欧盟成员国指比利时、丹麦、德国、希腊、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葡萄牙、芬兰、瑞典、英国等15国。
- ② 这里每年的FDI数据均为存量数据。na表示数据不可得。EU15指原欧盟15国流向新欧盟成员国的FDI占新欧盟成员国吸引FDI总额的比例。EU10指原欧盟10国流向新欧盟成员国的FDI占新欧盟成员国吸引FDI总额的比例。

参考文献:

- [1] Benassy-Quere, A., Fontagne, L. and A. Lahreche-Revil. How Does FDI React to Corporate Taxation?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J]. 2005, 12: 583~603.
- [2] European Economic Advisory Group. 2007,EEAG Report[R].
- [3]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Structures of the Taxation Systems of the European Union1995-2004 [R].
- [4] Gianmarco I.P. Ottaviano, Tanguy van Ypersele. Market size and tax compet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2005,67: 25~46.

Economic Integration, Tax Competition and FDI Mobility

— Analysis of Tax Competition between New and Old EU Members

LI Hui

Abstract: This paper follows the framework of tax competition theory developed by Ottaviano (2005), analyzing the tax competition effect on FDI inflow between old EU members and the new EU members. The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European marke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corporate tax competition, statutory corporate tax has no effect on FDI inflow, while effective corporate tax rate play crucial role in attracting FDI.

Key words: tax competition; capital flow; EU

(上接第 16 页)

- [11] Feenstra, Robert C. and Gordon H. Hanson. Globalization, Outsourcing, and Wage Inequal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 (2), 1996, pp. 240~245.
- [12] Hijzen, A., H. Gorg, and R. C. Hine.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the Skill Structure of Labor Demand in the UK[R].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249. 2004.
- [13] 王晓红. 中国承接国际设计服务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J]. 财贸经济, 2008, (8): 84~89.
- [14] 刘绍坚. 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研究[J]. 经济研究, 2008, (5): 105~115.
- [15] 任志成、张二震.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J]. 财贸经济, 2008, (6): 62~66.
- [16] 卢锋.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 2007, (9): 49~61.
- [17] Dunning, J.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Abingdon, 2, 2001.
- [18] Clague. C, Keefer. P, Knack. S and Olson. M. Contract-Intensive Money: Contract Enforcement,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9, pp. 185~211.
- [19] 江小涓. 服务外包: 合约形态变革及其理论蕴意[J]. 经济研究, 2008, (7): 4~10.
- [20] Altomonte & Bonassi. FDI,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Linkages[R]. CESPRI Working Papers 155, 2004.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Ability to Undertake Offshore Services Outsourcing

LIU Ya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ility to undertake offshore services outsourcing (OSO) and the determinants. It empirically asse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factors using panel data with a robust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more human capital, higher extent of economic freedom and better IT infrastructure, have more ability to undertake OSO. Considering the quality of offshoring services,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with higher labor cost have more advantage of undertaking OSO.

Key words: off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 labor cost; the extent of economic freedom; IT infrastructure